

吉田茂对华外交政策研究

厉娜¹, 张宗鹤²

(1. 北京城市学院 北京 100083; 2.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100094)

摘要: 吉田茂是日本昭和时代声誉卓著的政治家、外交家, 他对日本的经济、政治稳定和外交趋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从分析吉田茂内阁的对华政策入手, 着重分析其政策成因, 了解和把握其对当代中日关系的制约和影响, 并试图对其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身份的不同与关联进行探讨。

关键词: 吉田茂; 对华政策; 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 D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513(2013)-04-060-05

一、引言

吉田茂是依据《日本国宪法》选举产生的二战后第一任首相, 也是对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倾尽全力、地位显赫、影响深远的著名政治家。深入系统地分析吉田茂执政时期的中国政策观, 是研究战后日本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重要方面。本文从分析吉田内阁对华政策入手, 着重分析其内外成因, 了解和把握其对当代中日关系的制约和影响。并通过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考察, 探索吉田茂对华外交思想的基本特点及其政策影响, 理清日本战后外交特征之间的关系, 揭示其思想内涵和历史意义, 并为人们系统研究吉田茂战后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华政策以及日本政治思想史、外交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有力的依据和丰富的佐证。

二、吉田茂的个人资历及主政背景

吉田茂曾是二战前和战时日本外交界亲英美派外交家, 在外务省任职三十余年, 深谙中国事务, 在外务省有“中国通”之称。吉田茂

是以职业外交官的角色初登现代日本政治舞台的。在担负历史赋予的治国理政的重大使命之前, 历任驻天津总领事、驻奉天总领事、外务省事务次官、驻意大利大使、驻英国大使等外交职务, 离法西斯统制体制的权力中心较远, 甚至于一度受到军部独裁势力的排挤和打击。而这些经历, 使吉田茂对欧美资产阶级宪政体制的优越性有切身体会和深入了解, 是塑造吉田茂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政治性格的重要因素, 也使吉田茂有别于战前日本绝大部分封建色彩浓厚的政治家。而所有这些使得吉田茂成为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最易于接受的政治人物。除1947年5月至1948年9月在野之外, 从1946年5月到1954年12月期间, 吉田茂先后五次出任日本内阁首相, 执政累计长达七年之久。执政期间, 吉田茂对当代日本的政治、经济巨变做出了重大贡献。

吉田茂为战后日本民主政体的确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革核心的《日本国宪法》公布和实施, 是在吉田内阁时期完成的, 并据此制定了一系列与之相称的法律,

收稿日期: 2013年5月20日

作者简介: 厉娜(1986-), 女, 硕士, 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讲师, 研究方向: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宗鹤(1984-), 男, 硕士,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人事主管, 研究方向: 世界史。

为建立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作好了法律上的准备。虽然实施非军国主义和实行民主化改革是由美国占领当局强加给日本的，但是在封建主义残余极其浓厚的日本，如果没有像吉田茂这样具有和平与民主意识的政府首脑积极配合，其顺利实施是难以想象的，即使强制实施，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吉田茂改变了日本外交战略的走向。这种改变表现为以赶超欧美为目标的经济外交取代了战前以称霸远东为目标的军事外交，“经济大国，军事小国主义”取代了“军事大国，经济小国主义”。为此，日本奉行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依靠美国的支持重返国际舞台；军事上与美国结盟，采取守势战略；集中力量优先发展经济。从日本战略实践来看，正是靠成功运用经济外交，才较快实现了经济大国化的战略目标，政治大国化的目标也成为其后历届政府追求的目标。

吉田茂为维护政党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做出了贡献。政党政治是体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之一，是实现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有效方法。而战前日本政党力量的薄弱和政党政治的不健全，正是导致法西斯独裁势力上台的重要原因。吉田茂身体力行，开辟了由众议院第一大党执掌政权的政党政治惯例，不惜因此而付出失去政权的代价。1947年4月的众议员选举中，吉田茂所在的自由党沦为第二大党，“于是有人议论与民主党合作建立保守派联合内阁，更有甚者，有人主张从民主党内拉出一部分人来组织第一党。但是我决定把政权让给第一位的社会党，从此树立起我国民主政治的规范”。^①此举对缺乏民主政治传统的战后初期日本而言，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基于长期处理中国问题的经历，吉田茂自身形成了一种较为完善的中国政策观，在战后依然延续并在对外政策上充分表现出来。

三、吉田茂的对华外交政策

战后的日本外交政策都被严格限定在日美关系总方针——即对美“一边倒”的追随外交

的基本框架内，对华政策更体现出这一点。

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渗透进日本。吉田茂是坚定的反共派，向来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形同水火。可以看一下吉田茂因反战被宪兵队逮捕时的口供“即使对英美的战争失败，国体绝不会灭亡，但如果国内被赤化，那么日本只有灭亡。”^②就是说，认为共产主义得势的前景远比对外战争失败的可能更为可怕，更加难以接受。这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何其相似！吉田茂首登首相宝座时，更是险些因要求解决粮食危机的群众运动而组阁流产，吉田茂后来说“我的第一届内阁，由于共产主义者所领导的暴徒的实力斗争，遭到了阻碍。我的内阁是在红旗的包围和革命歌声中组建的。”^③

吉田茂早在1949年就提到日本在“政治上必须阻止现今席卷亚洲大陆的共产主义潮流。”^④他认为如果邻国实现共产主义化，日本也将岌岌可危。1954年当中苏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后，吉田茂认为这是对日本的一种和平攻势的预兆，它会波及日本，因此极度关注。针对这个宣言，他提到，“这种和平攻势在亚洲的目标就是日本，我认为这次声明就是一个具体的表现。因此，自由阵营的大国应该彼此协调，努力削弱共产党中国和苏联的团结。”^⑤因此，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在自由世界中都是处于抵抗共产主义的前哨地位。我们国策的基本方针必须从正确认识这个事实出发。面对共产主义的侵略，保卫自己就是保卫自由世界，保卫自由世界也就是保卫自己。”从吉田茂的思想轨迹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吉田茂执政期间，“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波及到日本”的思想始终在他头脑萦绕，这是他反共反华的主要思想根源，也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之一。

《吉田书简》的出台。吉田茂的对华政策事实上很大程度受美国的影响。吉田茂本身在考虑中国的问题上也有自己的一定方针，在他的《十年回忆》中提到，“在我看来，同台湾友

好，促进彼此经济关系，本来是我的宿愿。但是我也避免更进一步加深这种关系而否认北京政府。这是由于我认为：中共政权到现在为止虽然看来似乎和苏联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中国民族在本质上却存在着和苏联人不能相容之处，文化不同，国民性不同，政治情况也不同的两国，终将形成互不相同的状态。因此我不希望彻底使日本同中共政权的关系恶化。”^⑥然而美国的态度却是，日本绝对不能表明选择同哪一个政府议和。但如果表示选择台湾政府又将给许多承认北京的国家以不好的影响。美国十分担心日本的行动，所以在旧金山和会结束后的第四天，56名国会议员联名上书总统，声称“如果日本承认北京政权，并与其进行两国间接触，是违背美日两国国民最佳利益的。”美国同时派出杜勒斯特使到东京，说服吉田茂首相与台湾当局缔结和约。杜勒斯强调台湾处在远东军事战略要冲上，台湾政权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得到了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承认，北京政权被联合国指责为侵略国家，因此，日本为同台湾政权缔结和约而进行谈判是符合日本最大利益的。吉田茂迫于内外压力，又不想放弃其反华政策，遂同杜勒斯提交了《吉田书简》。

《吉田书简》的要点是：（1）“日本政府希望最终与日本的邻国之间建立全面的政治、和平及贸易关系”；（2）与占据联合国席位的“中华民国政府”“缔结条约”，“重建两国政府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3）条约中有关“中华民国”的条款，“适用于现在或今后可能处于中华民国政府管辖下的全部领土”；（4）借口联合国诬指中国为“侵略者”以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际上是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中共政权支持试图用暴力颠覆日本宪法制度及现政府的日本共产党”（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陆政权支持“日本共产党”；而这个“日本共产党”是试图用暴力推翻日本宪法制度以及日本现政府），声称日本政府“并无与中共政权缔结两国间条约的意向”。吉田内阁一方面不认为“台湾代表中

国”，仅与其实行“限定议和”，一方面宣称将来与中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为日后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伏笔，留有余地。吉田茂解释《吉田书简》的精神是：先与“现在支配台湾、澎湖列岛的政府缔约”，待“中共政权改变目前做法”时，将来“再与中国结成全面的睦邻关系”，“缔结全面的条约”，并将上述“两步走论”规定为日本政府对华方针的“主义”。^⑦1952年1月16日《吉田书简》在东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1952年5月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分别开始审议《日台条约》，7月5日两院通过了该条约。《日台条约》遭到了日本在野党的强烈反对和北京政府的抗议，这给中日关系的正常化设置了长达20年的障碍。

反共反华的对美追随外交。战败时的日本经济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尤其是粮食短缺问题。1946年大米歉收加剧了粮食供应危机，所以吉田茂以“战败国求胜于外交”的理念开始和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商谈，吉田茂看透麦克阿瑟内心“反共”的想法，所以吉田茂以反共为由向麦克阿瑟索取粮食。这是吉田茂战后反华的最初表现。^⑧而到了1951年，当《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签订的时候，日本虽然名义上独立，但军事和经济上依然依赖于美国。吉田茂的对华政策必然要追随美国，把日本的位置界定在“自由主义阵营”，并且反对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路线。^⑨签订《日台条约》是吉田茂内阁反共反华政策的集中体现，也开启了日本用“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策略限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先河。吉田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声明“一切都要看盟军总部的政策而定”，反对畅通中日渠道。政治上则采取静观其变的姿态。在议和谈判中，吉田茂内阁对美国的反共遏制战略亦步亦趋，敌视新中国，堵塞发展日中关系的渠道，构成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大障碍。日本一旦选择了美国的庇护与支持，就意味着将自己的利益纳入了美国战略的轨道，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处理外交事务，随着旧金山片面日和对约的签订，吉田茂内阁反共反华的对美

追随外交浮出水面，成为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主旋律”。

四、吉田茂对华政策的成因

由吉田茂内阁开创并确立的日本战后保守主义，成为当代日本政治的主流，历经五十余年而日久弥坚，冷战结束后更是呈现出日益加剧的趋势。吉田茂担任各级外交官的经历形成了他的“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倾向。吉田茂所倡导的保守主义，主要有如下特征：(1) 强调保持传统，维护秩序，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角度，不断强化国民对天皇权威的认同。(2) 强化国家的主导地位和权力，从而建立起一个对社会、对国民都具有很强统制力与统合力的国家。(3) 高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大旗，在客观上为保守政党在战后的长期统治地位提供重要的合法性基础。(4) 在对待日本社会发展和现代化问题上，强调以现实主义为其基点。(5) 强调真正的发展应在秩序中进行。不难看出，吉田茂的保守主义倾向以现实功利主义和民族实用主义为基点，这同战后日本对美低调追随、和平自守、经济至上的“吉田路线有着一定程度的内在联系”。正是基于这样的保守主义立场，吉田茂为了使日本早日摆脱战败国的局面，重返国际社会，就势必会不遗余力地大搞日美协调，因而追随美国反华亲蒋也就成为他的必然的选择。

吉田茂的对华外交政策，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部分，也就是战后日本国内的诸种因素导致吉田茂上台之后的内在成因和美国对华政策对吉田茂内阁影响的外在成因。

内在成因，一方面，由于日本宪法赋予内阁处理外交关系的权力，而且在吉田茂执政时期首相大多兼任外相的局面使吉田茂拥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在野党不仅没有坚决反对选择台湾当局作为议和对象，甚至也没有追究吉田茂先斩后奏式的外交决策的责任。在野党的无力反击，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现状使得中国贸易不可或缺论的影响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冷战的加剧也使日本的选

择范围急剧减少，难以提出能与吉田茂议和方案相匹配的设想。

吉田茂当政时期，正是以东西方对抗为标志的国际冷战格局的形成及确立时期。作为战后初期冷战最前沿的东亚国家日本，其外交政策如何，势必会受到冷战思维的严重制约。对于因战败而完全丧失防卫能力但又历来重视国防安全的日本来说，依靠美国实现安全保障的目标不失为一种现实的捷径。美国把日本纳入其全球战略的轨道，要把日本建设成为“亚洲工厂”的战略意向和日本的国策要求特别是吉田茂一贯的反共立场正好内外呼应。

外部原因，一方面，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和全球战略的调整左右着吉田茂内阁的对华政策。随着美国的亚洲战略重点国民党政权从大陆退居台湾，美国便把亚洲的战略基地移到日本。美国视新兴的社会主义中国为其推行全球霸权政策的障碍，为了封锁和遏制中国，拼凑了《日美安保条约》，日本成了美国策划的反华包围圈的前沿阵地，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的对华政策势必要服从美国反华反社会主义的“大局”。另一方面，日本统治阶级借助美国力量的需要也决定了吉田茂内阁为全力配合美国而推行反华政策。日本经济复兴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要靠美国提供，日本国家安全需要依赖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日本摆脱战败国的地位、重返国际舞台更加需要美国的全力支持。所有这一切，决定了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针不能偏离美国远东战略的轨道，在外交上跟着美国行事。吉田茂内阁牺牲部分外交自主权是取得美国保护与支持所必然付出的代价。而吉田茂一贯热衷于对美协调的立场，使其内阁反华政策的出台顺理成章。日本所追求的，正是美国强权下提供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带来的种种好处。

五、结语

综上所述，二战之前，吉田茂奉行日本对华侵略等政策而长期出任职业外交官，二战结束后，虽然中国已绝大部分实现统一，但这并

不是吉田茂所期待的统一。而此时战败的日本已经没有影响中国的力量。吉田茂进行反共反华的追随外交,是为了尽早摆脱被占领期,恢复独立,他不得不接受美国劝告和台湾当局议和的要求。从战后吉田茂上台开始,他凭借着近现代日本少见的“国际感觉”审视着国际社会。他觉得共产主义势力最可怕,于是就想方设法防止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并企图将中国从共产主义阵营中脱离出来,当计划失败时,便在美国政策的高压下,伙同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排斥、分化、瓦解的政策。吉田茂利用美国以及国内要求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的压力,诱使美国做出了对日本更加有利的让步。它使《旧金山和约》部分地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从战后日本发展过程来看,与美国结盟、优先发展经济的“吉田路线”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当然这也导致了日本在长时期处于没有独立外交的局面,同时又使中日邦交正常化推迟了20年之久。

注释:

- ① (日) 猪木正道著、江培柱、郑国仕译. 吉田茂的执政生涯 [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1986, 245.
- ② (日) 猪木正道著、江培柱、郑国仕译. 吉田茂的执政生涯 [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1986, 29.
- ③ 吴廷璆主. 日本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M]. 1994, 825.
- ④ (日) 猪木正道著、江培柱、郑国仕译. 吉田茂的执政生涯 [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1986, 314.
- ⑤ (日) 吉田茂著、赵宝智、吴德烈译. 十年回忆. 第1卷 [M].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126.
- ⑥ (日) 吉田茂著、赵宝智、吴德烈. 十年回忆. 第3卷 [M].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43.
- ⑦ 宋成有、李寒梅. 战后日本外交史 [M].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118 - 121.
- ⑧ 堀江薰江、人間吉田茂. 中央公論社 [M]. 1991, 371 - 375.
- ⑨ 浅井基文. 日本外交反省と転換. 岩波新書 [M]. 1989, 8 - 9.

The Research of Shigeru Yoshida's China Policy

LI Na¹, ZHANG Zong-he²

(1. Beijing Cit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in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Shigeru Yoshida, a politician and diplomat with good reputation in Japan's Showa-Era, has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Jap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diplomatic trend. Starting from illustrating the Shigeru Yoshida Cabinet's China policy,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formation of Shigeru Yoshida's China policy, and looks deep into the constraints and impacts that the policy affected on the contemporar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nd tries to discuss the different identity of Shigeru Yoshida as a politician as well as a diplomat.

Key words: Shigeru Yoshida, China polic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责任编辑: 刘文卿)